

对梁启超民权学说的解读

冯超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 民权学说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学说是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思想体系。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可以从两个时期来考察, 一是戊戌维新时期, 一是流亡日本时期。前期主要在于启发民众思想觉悟, 开通社会风气, 实现“君民共治”, 而后期融入了主权在民论、自由平等观、国民国家观。梁启超以报刊与西书为宣传媒介, 以学会与学校为宣传场所, 因地制宜, 使民权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对社会进步、国人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梁启超; 民权学说; 宣传方略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5-0012-06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 他的思想涉及众多领域, 如政治、文化、教育、宗教、史学、哲学、美学等。民权学说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从思想启蒙角度, 还是从近代化角度, 这一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都是巨大的。学界对梁氏民权学说的内容尚缺乏完整认识, 多数论文重点谈及民权与君权、绅权、国权、自由等之关系, 并没有全面深入民权学说的内涵, 且忽视了梁氏对民权思想的大力宣传以及这种宣传背后的思考。刘振岚认为梁启超民权思想的内涵是“以群术治群”, 只论及戊戌维新时期^[1]; 刘菊素认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也只考察戊戌维新时期^[2]; 肖良武对梁氏民权思想的认识已延伸到流亡日本时期, 关注到了梁对民权思想的宣传, 但论述不够完备^[3]。本文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对梁启超民权学说的内涵及梁氏的宣传方略作一系统梳理, 以获得新的认识。

一、民权学说的内涵

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可以从两个时期来考察, 一是戊戌维新时期, 一是流亡日本时期, 这两个时期的“民权”内涵不同, 前期较为狭窄, 后期逐渐丰富。

(一) 戊戌维新时期

梁启超的民权学说, 是基于高度的爱国情怀, 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对国情民情的深深思考而提出的。但是, 此时的梁启超仍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 完全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 其早期民权学说的内容一方面有顺应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另一方面又有受主观因素束缚的狭隘性。

1. 启发民众思想觉悟, 开通社会风气

甲午乙未(1894-1895)年间, 梁启超提出“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救时第一要义^[4]³³。不久,

收稿日期: 2007-12-26

作者简介: 冯超(1983-), 男, 安徽全椒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

梁便同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民权论，以救时弊。甲午战败之后，梁出于中国贫弱的思考，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缺权”，或是“无权”。所以，梁倡导广兴民权，广开民智，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开通传统思想浓烈而造成的极度闭塞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一开，便能培养民众的权利意识，广大民众懂得了权利，才能关心国家政治，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在这一时期，梁还提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5]177}。“兴绅权”是“兴民权”的重要手段。“民”在梁启超的意识中，是国家的根本，救亡图存的根本也只能在于“民”。绅士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别阶层，是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沟通桥梁。绅士一旦有了权利意识，必然会影响上下层社会，尤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深。通过绅士这一媒介，兴民权就容易实现。

2. 实现“君民共治”的立宪政治体制

“民权实实在在是中国‘士人’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地，以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生经验对西方近代政治文化的理解和领悟。”^[6]这句话对我们认识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内涵有重要启示。梁启超也是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没有过激的态度，基本上是“温和”的，做到了对中西文化两方面的兼收并蓄。他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提出“兴民权”，但他又考虑到中国君权强盛的事实，希望以“民权”完善“君权”，或是对“君权”进行弥补和纠正，以达到“君民共治”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君民共治”便是君主立宪政体的表现。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君主立宪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并不是立刻就要求实现，它还需要时间去探索。“兴民权”依然是作为实现君主立宪的一个准备。

此时，梁启超的“民权”是指“民众有权”，并不含有“民主”之意。他说：“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7]275}他还不能接受以“民作主”代替“君作主”，君主立宪是他认为最好的政体，也是很长时间内他追求的政治目标。因此，这一时期，尽管梁启超批判高度集中的君权，但并没有主张彻底以“民权”取代“君权”。他实质上是要求上层统治者下放权力，给民众以权力，让“民”与“君”共商国家大事。这在当时是一种“离经叛道”的主张，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猛烈抨击。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馆”赴湘“时务学堂”任教，“兴民权”言论更加强烈，因而引起湘中守旧势力的异常反感。湘中封建士大夫猛烈攻击梁的“兴民权”言论，他们从维护君上大权和伦理纲常的传统观念出发，抨击梁的民权学说。“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8]349-350}梁是从“民众有权”的角度探讨“民权”，希望通过民权的改善达到强国的目的，而反对者则出于对“民作主”的担忧和嫉恨，误解了梁的主张，梁对此做了很多解释。反对派强调“君权”与“民权”难以相容，“伸民权无君上也”^{[8]2}，梁则以英国为例，反驳保守派的言论。英国极重民权，但“君臣之间，无纤芥之嫌”，亦“未闻民权之侵害王权也”。“君依民为重，民依君为重，上下一德，君臣一体，无相侵之理，是为共治之要道。”^{[7]343}在梁看来，君权独尊，不利于政治进步；民权之兴盛，乃是国势强盛的条件。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虽时发民权论，但仍有所保留。这一时期，梁仍带有君权主义色彩，这由他的君主立宪政治观所决定。所以，此时梁启超的民权学说“还比较狭窄”^[9]。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把自己的民权学说限止在君主立宪的范畴之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深入反思，其后民权学说有了深刻的内涵。

（二）流亡日本时期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1898年11月，梁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办报宗旨明确提出：

“《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我国，我党弗措也。”“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7]478}后《清议报》因火灾而停刊，但梁启超继而又办《新民丛报》，宣传其民权学说，矢志不渝。为了阐述其民权学说，梁在日本期间还进一步学习西学，在接受西学影响之后，民权学说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

首先，接受了“主权在民”说。在日本期间，梁启超积极主动吸收西方的政治学说，对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极为推崇。他认为宣传卢梭的思想主张，能养成国民的权利意识。卢梭的“主权在民”学说主要认为人人有主权，人人自由，人人平等^{[7]504}。梁认为，中国国民不知有主权有自由。“若一国人民皆无权，则虽聚之，庸有力乎？”所以他说，“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10]国民有无权利意识，直接影响国家的盛衰安危。“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11]675}无根之树危也，国民无权利意识，国家没有根本，前途何在？梁接受“主权在民”说使其民权学说内涵有了新的发展，有学者早已指出，“梁启超接受并引进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给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12]。

其次，融入了自由观。在日本期间，梁启超也大力宣传自由、平等的主张。他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7]429}，自由和权利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自由就没有权利。他还认为，“自由之权”是国民理所当然的权利，“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1]675}。梁启超不仅宣传个人自由，还上升到了政治自由、民族自由。梁之所以大力提倡自由之权，主要是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4]35}，国民不知自由，奴隶性十足，默守陈规，不知进取。梁启超提倡“自由”，就是要医治国民奴隶性之心理弊病。“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4]235}融入了自由观之后，民权即为自由之权，“民权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7]339}。民权论的内涵得到了升华。

再次，提出了国民国家论。梁启超认为，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国民素质的高低关系国家的前途。“兴民权”就是要培养“新民”，使其成为国家之“国民”，从而具有爱国心和国家责任。他指出“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7]273}。梁启超把民权与国权相连，也就是把国民与国家相连，使民权学说的内容大大丰富。这一国民国家思想观，“不但极大地张扬了近代民主意识和社会变革主体意识，而且在近代中国率先设出一条旨在通过民众自我改造，自上而下实现民族自新的救国方略”^[13]。

综合上述，梁启超的民权学说是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思想体系。从早期普及文化知识，开通社会风气，到后来的“主权在民论”、“自由平等观”、“国民国家论”等，民权学说的内涵不断丰富。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梁启超思想的变化和发展正体现了其不凡与杰出的一面，他始终都在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以最饱满的热情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二、梁启超的宣传方略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民权思想学说。梁启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宣传方略，因时因地制宜，而使民权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影响力日渐扩大。

（一）宣传媒介：报刊与西书

梁启超一生主办过十余种报刊，尤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名气最大。梁启超的民权学说主要通过这三份报纸对外宣传。报刊在社会中的流通面比较广，能够为下层士绅以及

上层官吏所关注，所以宣传效果比较好。《时务报》创办于 1896 年 8 月，至 1898 年 8 月，共出版 60 期，发行总数达 12 000 份左右。梁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论文，每每有民权思想的流露，“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好奇心”^{[14]360}，吸引了约 12 万读者^{[14]396}。在民权学说宣传的初期，《时务报》的贡献是巨大的。“《时务报》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发行量最高，最受欢迎的头一份报纸，对上述地区（按，京沪地区）及全国士大夫的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促成维新运动蓬勃深入，对议院民权等西方政治观念和自然知识的普及作出了深远的贡献。”^[15]《清议报》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不久创办的，自 1898 年 12 月至 1901 年 12 月。戊戌政变后，清政府禁封维新派言论，所以发行量相对较少，但它也出版了 100 期，发行总数 4 000 份，约有 4 万读者^{[14]396}，实为不易。《新民丛报》自 1902 年 2 月至 1907 年 11 月，出版 96 期，发行总数 9 000 份，约有 18 万读者^{[14]396}。“《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4]274}，黄遵宪这一评价既肯定了梁办报刊的成绩，又表明梁办报刊产生了应有的社会效果。

梁启超十分重视西学书籍，主要在吸收西方有用之学，发挥西书在传播社会知识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作用。1896 年 10 月，梁编撰《西学书目表》，表现了对西学的高度重视。梁提出，国家要想自强，翻译西学书籍为“本原之本原”^{[5]45}。梁为什么如此强调翻译西书呢？首先，“中国之弱，由于民愚。民之愚，由不知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4]127}，所以需要翻译西书“救其弊”。其次，西学之书甚微。“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经济学）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4]176} 政治资生方面的书极少，而这些书又是开民智所急需的，因而翻译西书显得更为急迫。1897 年 9、10 月间，梁启超联合维新志士在上海创办“大同书局”，短短一年的时间内，翻译图书数十种，在开拓民众视野，了解世界大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有学之士，不通西文。梁启超指出，当今有志之士，虽志于学，难能成就，其原因有数端，其一即为“不通西文”，“非已译之书不能读”^{[5]19}。

（二）宣传场所：学会与学校

梁启超筹办了不少学会，1895 年 7 月，发起成立“强学会”；1896 年 3 月，发起成立“不缠足会”；1898 年 3 月，发起成立“保国会”。梁启超对学会极为重视，因为办学会在培养人才，开通社会风气，宣传民权思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梁设想在全国广设学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5]28}，待学会遍立全国，则“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5]28}。梁启超的设想不仅涉及学会的分布，而且提到了具体学会的分类，如农学会、矿学会、商学会、工学会、法学会、天学会、地学会等 20 余类，乃学西方“一学即有一会”^{[5]27}。学会种类多，分布广，则传学议学大为便利。“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5]28} 学会的针对性较强，是传播具体之学的最好场所，能够提高民众的思想水平，增加民众的科学知识。

梁启超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宣传的作用。变科举，设立新式学堂，推广时务思想，打破民智的闭塞局面，这是民族兴盛的根本前提。“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5]19} 1897 年 10 月，梁启超毅然离开“时务报馆”赴湘“时务学堂”任教，其中因素有诸多方面，出于对教育的重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梁看来，办报和办教育都能起到宣传自己主张、开通社会风气的作用。然而办报纸有利有弊，发行报纸，尽管可以畅谈所想，但毕竟受官府干涉，“文襄（张之洞）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16]，而在湖南办教育，可以避锋芒，湘中维新气氛浓，社会风气较早开化，易于接受新思想。梁启超入时务学堂后，继续阐述自己的

民权学说,造成很大影响。湘中青年学生接受新思想快,而且积极向外宣传。“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4]184}后来反对派对梁说在湘中的大肆传播极为恐慌,遂而严厉批判之,并将梁驱逐出时务学堂。通过学校教育来宣传民权学说,改造民众思想,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也是梁启超的救国之策。即使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仍坚持这一方策,大力办教育。“横滨之大同学校,神户之同文学校,均于先生(梁启超)亡命到日本后设立。”^{[4]185}

凭借报刊及西书为媒介,利用学会与学校为场所,是梁启超宣传民权学说的重要方式。这一宣传方略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民权学说的社会影响力便建立在梁的宣传效果之上。

三、学说的影响与价值

(一) 民权学说的社会意义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在构建新的思想价值观念方面,梁启超的民权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权学说要求“开民智”,“兴民权”,开通社会风气,使国民有理想,有觉悟,有权利意识,这对过渡时代社会思想的进步意义重大。后来,民权学说进一步要求培养“新民”,以有政治觉悟,有自由平等思想的“新民”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对过渡时代社会政治的进步意义重大。此外,民权学说在推动人的近代化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梁启超医治国民奴隶性的一面,打破了国人思想的不知进取、盲目闭塞、安于现状的老传统意识,使国人从“封建专制主义”,从“皇权至上”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从根本上推动了人的思想觉醒,开启了人的近代化意识。

(二) 民权学说的思想启蒙意义

在近代思想启蒙的过程中,有两位人物是不能忽视的,一是严复,一是梁启超。严复和梁启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启蒙国人的思想。严复从外向内,他西学知识深厚,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思想著作,极力输入在他看来能够救国救民的西方的主张,以达到启蒙的效果。而梁启超则从内向外,他极力发掘国人的弊病,力倡兴民权,开民智,从国人自身找出毛病所在,然后对症下药,以“中药”为本,辅以“西药”相治。这种中西结合的主张,更是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在思想启蒙中占有重要地位。胡绳评价说:“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转变后到1903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打开了眼界,而且从封建文化的对比中,更看到了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17]

(三) 民权学说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

梁启超的民权学说使传统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是从封建主义向近代社会的转变。20世纪初的知识青年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大多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启发。这种影响是历史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是近代社会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社会思想转变过程中需要某个特定人物对传统思想进行反思,以使人们能够顺利适应这一思想转变。梁启超正确认识到新旧思想交递过程的问题,他围绕这一问题不断思考,不断提出自己的主张,虽未能得出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却为后世知识分子的继续思考做了思想准备,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继续思考中萌发的思想解放大潮流。有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历史三部曲来看,构成五四思想先声的,是戊戌时期维新诸子充满革命精神的启蒙思想,其中,尤以梁启超的影响为巨。”^[18]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了陈独秀、胡适在内的几代知识分子,不愧为时代的精神导师。

参考文献

- [1] 刘振岚.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民智思想[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0, (3): 106-109.
- [2] 刘菊素. 浅析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1, (2): 60-64.
- [3] 肖良武.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启蒙思潮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4): 160-164.
- [4]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5]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1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6] 王先明. 近代绅士[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306.
- [7]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2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8]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65辑[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 [9] 罗检秋. 新会梁氏: 梁启超的家族文化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00.
- [10]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4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079.
- [11]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3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12] 宝成关. 梁启超的民权观与卢梭主权在民说[J]. 历史研究, 1994, (3): 8-12.
- [13] 方平. 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 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J]. 学术研究, 2002, (8): 110-112.
- [14] 张朋园. 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 [15] 廖梅. 汪康年: 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78.
- [16]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54.
- [17]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691.
- [18] 董德福. 梁启超与胡适: 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 2004: 75.

An Interpretation of Liang Qichao's Civil Rights Doctrine

FENG Cha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350007)

Abstract: The civil rights doctrin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thoughts. This theory is an evolving and continually transforming ideology. Liang's civil rights doctrine can be reviewed from two periods, one is the time of reform in 1898, and the other is the time of Liang's exiled life in Japan. During the two different periods, Liang's civil rights doctrine has two different connotations. By using the medium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taking academies and schools as propagandistic organizations, Liang's ideas was disseminated widely in the community and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social progress and people thinking and so on.

Key words: Liang Qichao; Civil rights doctrine; Propaganda strategy

(编辑: 李颖)